

希腊奇迹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 OF
THE GREEK MIRACLE

的

观念基础

荷马史诗与
西方认知史的
开源研究

陈中梅
——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希腊奇迹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 OF
THE GREEK MIRACLE

的 观念基础

荷马史诗
与
西方认知史
的
开源研究

陈中梅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腊奇迹的观念基础: 荷马史诗与西方认知史的开源研究 / 陈中梅著.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321-6530-8

I. ①希… II. ①陈…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哲学史—研究

IV. ①B5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第052623号

发行人: 陈征

责任编辑: 肖海鸥

封面设计: 周安迪

书名: 希腊奇迹的观念基础: 荷马史诗与西方认知史的开源研究

作者: 陈中梅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30.5

插页: 5

字数: 410,000

印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530-8/G · 0198

定价: 98.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8180628



目 录

001	绪 论
	第一章 希腊奇迹及其成因解析
041	一、欧洲文明的希腊源头
048	二、希腊奇迹
053	三、东方文明的滋养
063	四、希腊奇迹的成因
068	五、“内部”条件
	第二章 荷马史诗与希腊奇迹的产生
083	一、荷马元素与观念的“蒸馏”
096	二、荷马史诗与希腊哲学
109	三、历史的先驱
116	四、希腊奇迹的“开端场次”
	第三章 荷马的英雄观
127	一、“Ηρωες”词源及其他
134	二、阿瑞特
139	三、平民英雄
	第四章 英雄观续篇
153	一、伊萨卡和斯开里亚的英雄们

163	二、英雄气短
170	三、亡灵：英雄死后
	 第五章 特洛伊首领也是英雄
177	一、“住手吧，亲爱的孩子们”
187	二、神一样的人中豪杰
194	三、英雄阿德瑞斯托斯
201	四、其他特洛伊英雄
	 第六章 宙斯钟爱赫克托耳
209	一、宙斯·达耳达诺斯·赫克托耳
215	二、Diiphilos：赫克托耳与阿基琉斯
219	三、“宙斯只对他一人垂青”
	 第七章 凡人中的神明
227	一、赫克托耳的“渴望”
234	二、普里阿摩斯对儿子的至高评价
	 第八章 保卫特洛伊
243	一、荷马与苏格拉底
248	二、特洛伊战争与阿开亚人的诉求
255	三、两种道义力量之间的抗争
260	四、护城的中流砥柱
268	五、“摆下自由的兑缸”
	 第九章 神一样的求婚人
279	一、有所不同：帕里斯和《奥德赛》里的求婚人
285	二、求婚人是英雄吗？

- 290 三、开法勒尼亚最优秀的男子
295 四、欧鲁马科斯
299 五、安提努斯
304 六、荷马史诗的观念史意义

第十章 客谊

- 311 一、注重共性
315 二、客谊观念的产生与陌生人文化
322 三、宗教背景
329 四、文明·野蛮·波鲁菲摩斯

第十一章 互赠铠甲

- 341 一、互为客友
347 二、客谊与西方认知史
352 三、两部荷马史诗的内在主题
359 四、宙斯的大局观

第十二章 战地审美

- 368 一、特洛伊长老
372 二、普里阿摩斯
380 三、“念想你的父亲”
389 四、吃喝·凝视·聆听
394 五、无偏见和非功利审美

405 附 录

421 参 考 文 献

457 索 引

479 后 记

绪 论

历史的演变受自然条件、物质基础和社会因素的支配,也受观念和观念资本的深度制约。如同金融资本一样,观念资本的形成也有赖于旷日持久的积累。思想、理论和观念固然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却也并非只是物质条件、社会状况和历史现实的话语或文字附庸。重要智识成就的人文持存力往往远超见证其产生的社会,有的甚至还可以纵贯历史。基于这一认识,也有鉴于本书的叙事主旨,我们在承认并尊重其他因素之功效的前提下,将重点阐述认知活动与思想形成之间的关系,突出观念的作用。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出现,背后肯定都有观念或思想力量的推动。一个后来被证明为非常重要的观念或观念体系的形成需要时间,它的经常不为时人所明晰意识到的效应展示,有时可能相对快捷一些,有时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谈到促成十七世纪西方科学革命兴起的原因时,英国哲学家、科学史家 N. A. 怀特海指出:

如果把欧洲各民族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的两百二十多年中的思维活动作一个简短而十分确切的叙述,就会发现他们一直是依靠十七世纪的天才在观念方面给他们累积的财富来活动的。这个时代的人继承了十六世纪的历史性革命所具有的观念酵素。同时他们又把涉及人生各方面的现成思想体系传给后代。^①

① 怀特海 1997:38。“在观念方面给他们累积的财富”原文作“the accumulated capital of ideas provided for them”(Whitehead 1959:42)。“capital of ideas”宜作“观念资本”解。深入研究西方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不宜忽略“希腊留给欧洲的思想遗产”(戴克斯特霍伊斯 2010:10)。“这份遗产有两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一些伟大的基本观念,它们更多是哲学性的而非科学性的。虽然它们并非永远有效,但却一直影响科学的发展至今;其次是希腊哲学的一些正面成果,后来者往往以此为基础,至少以之为出发点。”(同前引书)

人必须首先解决温饱问题,然后才能从事各种思想和精神活动,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如果食不果腹,身无居所,哥白尼不可能提出日心说,牛顿也不可能写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然而,物质的这种第一性只有从能够维持生命的意义上来评判才是绝对不可替代的;基本的物质需求和生存条件得到满足以后,个人的才华和思想的重要性将凸显出来,^①观念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有可能超过物质,成为促成重大事变的主要因素。不是任何衣食无忧的人都能发动并领导 1789 年的法国革命或 1911 年的中国辛亥革命的。如果不是因为相信世界是可知的,麦克斯韦不可能创立电磁理论,伦琴也不可能发现 X 射线。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怀特海可以在研究中把目光聚焦于促成近代科学兴起的“思维中的各种要素”、“本能的信念”、“观念酵素”和“观念方面……累积的财富”上,^②而把“诸如财富和闲暇时间的增加、大学的扩展、印刷术的发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哥白尼、瓦斯哥·达·伽玛、哥伦布、望远镜”等许多人可能会倾向于优先考虑的人物和事项,全都划归为“科学兴起过程中”出现的“无须细谈”的“偶然因素”^③。怀特海重视人的“本能的信念”和心理状态,在他看来,至中世纪晚期,“欧洲人的心理那时已经准备好了一次思想上的新冒险”^④。笔者原则上赞同怀特海教授的见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当然与 1914 年 6

① “天才并不是把才能组合起来的结果。多少大队士兵 (battalions) 相当于一个拿破仑呢? 多少二三流诗人 (minor poets) 可以构成为一个莎士比亚呢? 多少普通的科学家 (run of the mine scientists) 可以完成一个爱因斯坦的工作呢? 这一类问题的提出并非为了取得答案,它的用意不过使人确信天才的独特无双 (the uniqueness of genius) 而已。”(胡克 2006: 18; 英语原文见 Hook 1945: 26)

② 怀特海 1997: 38。“观念酵素”原文作“a ferment of ideas”(Whitehead 1959: 42)。

③ 怀特海 1997: 16。在别的著述中,怀特海肯定了望远镜的重要作用,认为此物虽然“可能会作为玩具而(被)保留”,但在伽利略手中却“引起了一场革命”(科恩 1999: 493)。

④ 怀特海 1997: 16。细读并比较英国中世纪思想史家大卫·瓊尔斯的如下评述:“这次伟大的再觉醒(参看本书第 9 页注⑤——引者按)找不到充分的缘由。人们已经提出的那些原因诸如和平在西欧的恢复,以及随之而来的有序政府,财富与闲暇,当然都不是这样一场广泛、持久和富有活力的变革的根本性原因,它们甚至也不是其必要条件。这个复兴可以用一个极好的明喻来描述:它是欧洲新族类心理上和智力上的青春期。”(瓊尔斯 2012: 126)

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的不幸遇刺有关,但也和一些酝酿已久的深层次原因不无干系。“一些严肃的诗人和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在颂扬”那种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战争狂热纠缠在一起的“英雄主义”,由此培育出一个崇尚战争的“更深的心理因素”,并最终“对加速可悲的战争爆发起了作用”^①。对任何重要问题的研究,都需要涉及深层,触及心理和观念的层面。诚然,通过实践能够总结出经验,而凭借一般的“经验之谈”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示观点的合理性,但真正可靠且经得起诘问的正确结论的得出,则需要通过基于实践却又不受其局限性束缚的理论思维,需要通过严格和缜密的概念推演。怀特海重视“观念财富”或“观念资本”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其不足之处可能在于低估了某些“无须细谈”的“偶然因素”的重要作用。重视观念的人文效益并不意味着必须放弃别的解析维度,而承认并且肯定观念的重要性,也并不意味着必须排斥具体历史事件的介入和各种社会机构的作用。我们知道大学的不可或缺,也知道伽利略的天文学发现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望远镜的帮助。“通过望远镜获得的新的观察资料”,使得他成功“否证了托勒密体系”^②。有必要指出的还有,怀特海研究的是现代科学的兴起,而非西方科学的起源,所以不太可能、事实上也没有必要指出公元前七至前六世纪希腊人的心理状态,也许有些类似于十四、十五世纪的欧洲人。我们的研究表明,当时的希腊人确实已经或多或少地做好了迎接变革的心理准备,而荷马史诗则攻守皆备,一方面坚守传统的神话防线,另一方面也为这种“准备”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观念依据。^③

① 杰克逊 2010: 29。

② 科恩 1999: 102。

③ 怀特海的科学史观与我们的有所不同。怀特海教授一方面承认“要找到现代观念的源头就必须看看希腊的情形”,另一方面又认为除了亚里士多德这个“极大的例外”,希腊哲学家们虽然做了“一种观念上的准备工作”,却没有发展出“我们所理解的科学”(怀特海1997: 7)。在他看来,西方“科学思想的始祖”不是哲学家,而是把英雄们的业绩当作证明命运(fate)之“不可逃避地发生”的“个别实例”的“古雅典的伟大悲剧家”(转下页注)

纵观整部西方文化史,就其宏观走向而言,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种人文元素亘古不变的独断统治,而是两个基质成分,或者说两种观念力量之间持续不断的纷争和与之相关的必不可少的妥协。西方学者熟悉他们文化的二元品质,国内学者在著述中论及这一点的亦不乏其人。中外学者常用的非基质性成对术语很多,包括诗与哲学、诗性与科学、神话与理性、神话世界与观念世界、虚构与逻辑、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知识、启示与哲学、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启示与哲理、激情与理智、欲望与理性、谎言与真实、谬误与真理、直觉领悟与理论分析、神话想象与哲学论证、诗性想象与理性观察、荷马与希腊哲学、荷马与苏格拉底、狄俄尼索斯与阿波罗、希伯来要素与希腊要素以及耶路撒冷与雅典等。细察诸如此类的二元表述,我们可以发现所有这些成对术语中的第一个词项其实是广义上的“同义词”,诸多看似不同的词汇或词汇组合形成了一个大致“同义”的语义集群;而上述对等术语中的第二个词项就词

(接上页注)(前引书:10)。“科学思想的始祖”原文作“the pilgrim fathers of the scientific imagination”(Whitehead 1959:17)。怀特海区分了哲学和科学,这很有必要,但他可能忽略了希腊自然哲学其实也包含科学,也就是说,没有充分认识到科学或自然研究在希腊哲学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希腊人为哲学思想,并且,由于哲学和物理学最初是不可分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构成了基本的观念,后来整个欧洲的哲学和科学,都是在这些基本观念之内活动并至今仍在运用它们。”(策勒尔 2007:10—11;参看 Stallknecht and Brumbaugh 1958:3;策勒尔的《古希腊哲学史纲》用德语写成,由 L. R. Palmer 译成英语,翁绍军中文译本由该英译本译出)“基本观念”英语译文作“the basic ideas”(Zeller 1955:3)。有必要指出的还有,希腊命运观的始作俑者不是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悲剧作家,而是他们的先师荷马。“但是,在这些‘优哉游哉的诸神’的背后和顶上,耸立着一种权力,荷马史诗中的人们以对奥林波斯山诸神更大的虔诚仰视着它——那就是永不变更的命运之神。莫依拉(Moira)与奥林波斯诸神搏动着的生命力相比,命运是一个冷酷的抽象物,这是人们开始领会一切事件都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这一事实的产物。”(策勒尔 2007:17)“But behind and above these ‘care-free Gods’ there stands a power to which the Homeric man looks up with almost greater seriousness than to the Olympians—Moira, immutable fate. In comparison with their pulsating vitality it is a bloodless abstraction, the creation of men who were beginning to grasp the fact that all events are governed by natural laws.”(Zeller 1955:9;参看 Parkes 1959:186)讨论“荷马遗产”(the Homeric heritage)在催生自然哲学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时,H. B. 帕科斯提到了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荷马宗教内含的自然主义倾向(the naturalism of the Homeric religion),另一个便是荷马所持的关于非人格化的命运的观念(the Homeric conception of an impersonal fate,详见前引书:186—187)。关于 moria,详见本书第186页注②。参看 Nilsson 1949:169—172。

义来说也一样,如同百川入海一般形成了与第一个语义集群相对立或可资对比的另一个语义集群。面对概念纷呈的芜杂局面(这么说并不等于我们有意否认上述概念的词义差别和常态语境中极佳的表意有效性),我们能否提纲挈领,透过表象,抓住本质?换言之,我们能否找到一对涵盖面更广、概括力更强的统领概念的概念,以便把上述两个语义集群分别统括起来,从而能在更高的层面上并以更为精练的方式,尽可能准确和稳妥地把西方文化二元对立互补的基本格局揭示出来?作为学者,我们有时不仅需要,而且似乎还有责任勉为其难。基于多年来的潜心研究,也有感于从某种特定的角度来衡量中外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提法的众说纷纭,当然主要还是出于对深入探析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实际需要及其理论可行性的考虑,笔者于1998年6月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投竿也未迟”——论秘索思》一文,^①提出了西方文化的内核是由两个基本要素,亦即是由秘索思(μῦθος)和逻格斯(λόγος)这两个希腊元素构成的观点。按照笔者的理解,秘索思和逻格斯是两个基质成分,也是两个元概念,二者既相生相克,又相辅相成,既是势不两立的竞争对手,又是互为依存的合作伙伴。秘索思和逻格斯缺一不可,共同建构了西方文化的深层模式,打造出它的基质底蕴。^②

评估一种文明的战略竞争力,可以从细察它的基质成分以及由基质成分搭建起来的文化基本结构入手。因此,秘(索思)—逻(格斯)模式不仅是一种理论设计,而且还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具备广阔而深远的应用前景。秘—逻模式适用于对西方学者的某些虽然流行却不一定稳

① 该文的完整版以《论秘索思——关于提出研究西方文学与文化的“M-L模式”的几点说明》为题,作为附录见诸商务印书馆1999年8月出版的拙著《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的拙著《言诗》中有“秘索思”一章,是为该文的修订版,但改动的幅度不大,基本上保留了原文的叙事样式。“投竿也未迟”语出李白晚年所作五言诗《赠钱征君少阳》。

② 关于秘索思和逻格斯的元概念属性以及二者之间对立互补的运作态势,详阅拙文《μῦθος词源考——兼论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上、下篇(分载陈思和王德威主编的《文学》2013年春夏卷和秋冬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2014年)。

当的重要观点的审视,也适用于对我国源远流长的西学迎拒史的重新梳理,此外或许还可作为研究其他文明之基质结构的参照,但它的价值首先还在于继往开来,借助多种必要的延扩性表述的辅佐,为人们认识并解析西方开辟一个新的视角,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上文已简要谈及怀特海关于近代科学起源的论述。现在,有了对西方文化二元品质的介绍作为引子,我们似可结合对理论或秘一逻模式的实用性的思考回到这一话题,继续业已开始的讨论。^①

如果允许进行最大限度的概括,我们要说整部西方科学史的轮廓实际上是由两个性质大致相同的过程,也就是说,是由两次起因和结果都不无相似之处的范式变革组成的。逻格斯两次战胜秘索思,一次发生在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具体表现为哲学对神话的否定和颠覆,另一次发生在十七至十八世纪,具体表现为科学对基督教及其神学的质疑以及随之而来的批判。逻格斯的胜出既得力于自身的强悍,也得益于秘索思不一定符合自身根本利益的铺垫。两次胜出的共同之处在于逻格斯取代秘索思,成为促进西方文明进程的主要推力。^② 秘一逻模式的实用性在以上分析中得到了体现。既然是广义上的“重复”,两次过程及其成因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某些相似之处。事实上,除了别的类似,如同我们指出荷马史诗为公元前七至前六世纪的希腊人提供了观念基础,使他们做好了迎接变革的心理准备,怀特海亦曾以他的方

① 秘一逻模式为解析西方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概念支点。下文将以对西方科学史的轮廓描述为例,就此议题略作阐释。

② 但是,逻格斯强悍,却并非所向无敌。如同秘索思的被攻击一样,逻格斯也会为秘索思的反击提供靶子,以自己的强势发展和由此暴露出来的局限为秘索思的胜出或自身(即逻格斯)的受害创造条件。我们知道,基督教曾经战胜希腊科学,而兴盛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新神话”,亦曾对之前踌躇满志的理性主义和启蒙思潮发起过强有力的冲击。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作为打造西方文化结构底蕴的两个基质成分,秘索思和逻格斯都具备接受“异化”的功能,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进入对方的领地。暂时失败的一方不会销声匿迹,它会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及时改换门庭,在异己却并非全然陌生的人文环境下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失败是另一种形式的胜利。秘索思与逻格斯之间的互动,由此似乎具备了超越胜负的意义。没有希腊哲学的实质性参与,不会有系统的基督教神学。作为相反的例证,没有神话思维和诗化意识的强有力辅佐,大概也不会有谢林、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哲学。

式,肯定了经院哲学(或经院神学)和“中世纪思想对科学运动的形成”所作出的“巨大贡献”^①。

西方世界不乏明晰洞察到上述两次过程中存在明显相似之处的学者。A. T. 琼斯的洞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② 卡尔·雅斯贝斯指出过“希腊理性”和“现代理性”之间的相通之处,^③也看到了希腊人在他所说的“轴心期”(the Axial Period)就已经为后世导致“历史的突变”的日耳曼—罗马民族的科学革命准备好了有待于“显示自己”的“胚胎”^④。与大卫·瓏尔斯等学者相对宽泛的阐述有所不同,^⑤当代以

① 怀特海 1997: 12—13。中世纪思想中的精华发轫于十一、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末已蔚为大观。“我们观于十三世纪发展之迅速,便可知在其先前所已成就的工作之伟大,后来一切时期的人士,无不得力于十二世纪创立了的基础。譬如,在上述那些可庆的事实发现之后,不多几时,约于 1226 至 1230 数年中巴黎主教奥法因之威廉,弗朗西斯派海尔斯之亚历山大便提出了他们的伟大思想体系;接着就有罗杰·培根、波那文图拉、阿奎那和雷蒙·洛立(Raymond Lully)之崛起。假如当时非先已有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的事业便是不可能的。因为十二世纪奠下思想的胎芽,所以才能有十三世纪的生长和发达。”(伍尔夫 2005: 38)“十二世纪奠下思想的胎芽”,原文作“a preparation already assured in the twelfth-century leaven of doctrine”(Wulf 1953: 64)。“leaven of doctrine”似宜作“学说酵剂”或“学问酵素”解。比较怀特海的用词:“a ferment of ideas”(Whitehead 1959: 42)。“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怀特海 1997: 13)。当然,中世纪思想不是无本之木,而是有其清晰可辨的希腊渊源。“的确,只要我们想到十二和十三世纪,我们就可以说,几乎中世纪哲学的所有主要观念(〈almost all the leading ideas of medieval philosophy〉)也有部分例外分支,即后来的自然神学)都等同于或直接来源于公元前 450—前 300 年期间雅典的一小批希腊思想家中流行的观念。”(瓏尔斯 2012: 31—32;英语原文见 Knowles 1988: 3)

② 希腊自然哲学的产生动摇了神话的根基。同样,产生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达尔文主义(Darwinism),对西方传统的圣经文化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详阅 Jones 1952: 241—242)。

③ 雅斯贝斯 1989: 75。我们也许有必要认真思考冯·赖特的如下提法:希腊科学与近当代西方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旨在服从或顺应自然”,而后者却“旨在控制或驾驭自然”(赖特 2003: 7)。不过,赖特教授的本意却不是以此来否定现代科学对古希腊科学精神实质上的继承。谈到西方文明的犹太传统和希腊传统,亦即“耶路撒冷和雅典”特征时,赖特写道:“在基督教中被继续的犹太传统,是一种宗教和道德主义的传统。自古希腊起,我们就承继了这样的信念,即相信事物的自然秩序的可理解性,并且相信作为科学之性格的理性探索精神。”(前引书: 1)

④ 雅斯贝斯 1989: 73—74。“胚胎”英文本作“embryo”(Jaspers 1953: 62)。

⑤ 对于希腊文明最佳发展期的到来,瓏尔斯的评估侧重于思想,但也有些趋于宽泛。在这里,我们赞赏的是他洞察相似性的敏锐眼光,指出了公元 1000 年以后西欧人心智“伟大的再觉醒”与公元前 1000 年左右古希腊人心理状况之间的“类似”,并且用了(转下页注)

色列科学史家施缪尔·桑布爾斯基对西方科学史上的这两次重大变革作过精彩的论述,堪称这方面的代表。在有影响的《希腊人的物理世界》一书中,桑布爾斯基明确指出:

希腊科学通过逻格斯(logos)反对神话(mythos)所赢得的独立,在许多方面类似于(similar)现代科学的诞生,后者通过抨击中世纪僵化的经院主义而得以实现。随着对自然的研究挣脱了神话想象的控制,科学作为一种智识体系就拥有了发展的前途。同样(similarly),科学从中世纪哲学教条的掌控中摆脱出来,也就为现代科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自律部门(an autonomous province)的兴起做好了准备。^①

(接上页注)“的确是非常惊人的”(is indeed very striking)一语予以强调:“公元1000年在西北欧,就像约公元前1000年在爱琴海周围的人们中那样,联合起来产生了人的精神和心理素质的那些要素开始聚集起来,并以一种极为和谐的方式混为一体。这种与古希腊的类似(the parallel with ancient Greece)的确是非常惊人的。”(璪尔斯 2012:126—127;英语原文见 Knowles 1988:75,此书1962年首次出版)“在希腊,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前和他们在世之时,逻辑和辩证法的武器转而被用来反对古老神圣的制度和学说,就像它们在中世纪的法兰西一样。在希腊,就像在欧洲一样,一种怀疑论的和机会主义的思想派别成功地打破了由伟大的、具有创造性的大师们建树起来的思想体系,在希腊,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欧洲,是波那文图拉和圣托马斯。”(前引书:127)

① Sambursky 1956:4. mythos 即 μῦθος (mūthos, muthos)。细读该书第1—5页。宇宙是有序因而是可知的,这是针对天体、科学和形而上学问题进行严肃思辨的观念前提(详见 Lloyd-Jones 1971:162;参阅 Guthrie 1962:26,29, Burn 1967:338)。关于这一观念在产生希腊自然哲学和推动欧洲近代科技革命方面所起的相似作用,分别参看基托和托比·胡弗的相关论述(Kiito 1964:176—177,胡弗 2012:1)。希腊哲学家中,有人把宇宙看作是某种复杂的机械(Stallknecht and Brumbaugh 1958:3);同样,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科学家中也有人认为,宇宙的工作原理如同做工精细的钟表(戴克斯特霍伊斯 2010:485)。科学革命的发生有赖于两个观念的确立。这两个观念一个是“自然秩序的观念”,另一个是“人类天赋的观念”(即人类具有认知自然秩序的理性),二者以有所不同的表现形式,为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人和十七世纪的欧洲人所具备(详见布林顿等 1983:313—314)。“在汤因比看来,我们的世俗化的科学技术的文明似乎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在我们之前所做的事情的几乎是毫无意义的重复’。”(斯特恩 2012:344)。请注意“重复”一词。当然,这种重复肯定不是依样画葫芦,更不会“毫无意义”的。1948年,华夏图书出版公司刊印了哲学家严群的著作《希腊思想》。该书“与一般的哲学史著作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即只是围绕一个中心,从追溯近代西方文明的根据出发,集中论述了古代希腊哲学中自然哲学与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联系”(黄建德 2011:142)。参考并比较(转下页注)

桑布爾斯基教授目光犀利,見解深湛,從科學史的角度來衡量無可挑剔。然而,如果從文化史的角度來分析,尤其是從西方文化基質構成的角度來評判,他的解析也許就會略顯流於表面,在力度方面顯得有所不足。桑布爾斯基看到了希臘科學的產生“在許多方面類似於現代科學的誕生”,也提到了 *logos* 和 *mythos*, 卻沒有把二者當作兩個元概念來看待,因此不能很好地體現文化基質的主导作用,未能抓住隱藏在“形似”下面的“神似”,揭示出兩次過程本质上的相似性。需要說明的還有,上述引文中的“中世紀僵化的經院主義”和“中世紀哲學教條”既不同於希臘神話,也不同於聖經故事和教會的宗教實踐,因而不是純粹的秘索思。經院主義及其哲學的本质和首要任務是基於信仰的教義宣傳,但它的表現形式卻經常是“學術”的,是披着哲學外衣的神學教條。所以,我們不僅應該看到神話與哲學以及宗教與科學的衝突,而且還應該看到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科學的對手除了宗教,還有通常作為其盟友的哲學。哲學和科學當然可以聯合起來反對宗教,但宗教和哲學亦可能有意無意地聯合起來,共同反對科學或阻礙它的發展。如同公元前五世紀“西方臨床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告誡當時的從業者們應該警惕抽象的哲學理論對醫生觀察實踐的干擾,^①“培根和笛卡爾都倡導摧毀古代哲學”,其學說對十七世紀後期的科學發展產生了重大

(接上頁注) Jardé 1926: 2, Dawson 1958: 15, Graham 2006: 307。順便說一句,桑布爾斯基所說的“類似於”(similar),亦可在一個更為宏闊的層面上,適用於對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上半葉一些西方思想家們的理論建構及其歷史地位的效益評估。在一位國內學者近年發表的專著《深層生成論:自然科學的新哲學境界》里,我們讀到這樣一段話:“利奧塔在1979年撰寫的《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一書中,提出文藝復興以來的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是‘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s),他又稱之為‘元敘事’(metanarratives)和‘大師敘事’(a master-narrative)。利奧塔認為,現代主義哲學家們所建立的理論是人類理性用邏輯戰勝神話的不斷進步的故事,是旨在對經驗和歷史進行全面的總體解釋的抽象觀念,是整理與解釋知識與經驗的全面的整體的文化敘事框架。這是以某種絕對的原則作為敘事基礎而建構的體系,在哲學上表現為本质主義,抽象主義和普遍主義。”(魯品越 2011: 431—432)

① 希波克拉底區分了理論(或論述,“logismos”)與實用知識,亦即得之於細緻臨床觀察的經驗的不同(詳見 Jones 1957: 312)。有必要指出的是,哲學和科學的範式歸屬均為邏格斯,二者之間可能發生的衝突通常屬於“兄弟鬩牆”,不是結構性的,其共同的“敵人”是秘索思。